



从东吴、东晋到南唐、南宋，从明清到中华民国，通过南京这扇窗户，以史学家的哲思、文学家的妙笔把中国的历史说一遍。

上期提要：宋朝的南京赏心亭，无论北宋南宋，都是著名的宴客和送别之所。这地方，与东晋时的新亭对泣，几乎异曲同工，既是日常生活中登高望远的一个风景点，同时也给了文化人借题发挥的机会。北宋时，赏心亭留下的诗歌，与隋唐十分相似，都是感慨前朝往事，叹惜六朝兴亡，至多也不过是带一笔南唐。

她认为辛词有盘旋沉郁之姿，他的愁恨悲慨，都像是咬着牙说出来的，豪放词人必须写得像辛弃疾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好，才算是不空洞，才算是言之有物。

叶嘉莹特别欣赏把吴钩看了的“看了”二字，落日楼头是景，断鸿声里是声，江南游子是人，吴钩是物，是用来杀敌的宝刀，也可以比喻一个人的才干和本领，可惜报国无门，栏杆拍遍，还是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南宋初年的南京，到处都是渴望收复失地而不能的痛苦，还有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失望。这仿佛是当年南京建康赏心亭上拍摄的一段视频。画面清晰而生动，只有读明白了这首《水龙吟》，大家才能真正地了解辛弃疾，才能真正地理解北方沦陷后，在留都南京街头涌动的那股激烈抗金情绪。

《景定建康志》

赵氏宋朝在文化上非常出色，却犯了两次致命的错误，一是在北宋末年，联金抗辽，结果契丹人的大辽被消灭，大金崛起，顺便也把北宋给灭了。二是南宋末年，联合蒙古人的元抗金，金很快灭亡，南宋也彻底完蛋。这两个错误如一辙，俗话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不能在同一个人地方摔两次跟头，然而大宋王朝就是这样天真和幼稚。

天底下有很多事情，确实难以预料，历史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宋人“兴文教，抑武事”，崇文轻武，文臣治国，有时候会显得书呆子气十足。如果辽不灭，北宋在北方就有一个巨大的缓冲地带，金不亡，南宋也是一样。引狼入室，唇亡齿寒，北方的保护屏障没有了，接下来只能是害人害己。事实上，尽管宋朝两次遭受异族入侵，南京在整个宋朝期间，社会生活都显得相对平静，一方面，与没有什么严重的内乱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宋朝的重视文化有关。

经历了数百年的变迁，经历了六朝和南唐，南京人变得越来越文气，越来越善于在和平环境中生存发展。北宋词人张昇曾写过一首词《离亭燕》，描绘当时江宁府的繁荣：

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水浸碧天何处断？霁色冷光相射。蓼屿荻花洲，掩映竹篱茅舍。

云际客帆高举，烟外酒旗低亚，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

王安石的《钟山晚步》，写了自己晚年在南京安逸的隐居生活：

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

槿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宣城卖酒家。

北宋时期的南京，比较荒唐的一件事，就是把玄武湖给填了。王安石做江宁知府，以粮为纲，他的治湖方案竟然是“废湖为田”，将湖面统统变成良田。历史上的玄武湖与杭州西湖相比，不知道要大出多少倍，它与长江直接联在一起，今天已无法想象它的水面有多辽阔。六朝时期，帝王湖上检阅水军，桅樯林立旌旗蔽日，楼舰五百雄兵十

万，鼓角声震天动地。玄武湖因此消失了二百多年，经过后来元朝的两次疏浚，才重新在南京的版图上出现，湖水面积当然就有点惨不忍睹，浩瀚二字再也说不上。

王安石与南京很有缘，他显然特别喜欢这个地方，除了在此地三任知府，少年时代便在南京生活过，他父亲在这当官，父母兄弟包括他自己。死后也都葬在江宁。王安石在南京前后二十多年，公元1084年，苏东坡来南京，“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说”。这时候的王安石，已退出政坛，像个离休老干部那样隐居在东郊的半山园，过去因为政见不同，两人关系有点僵，现在都是下台的官员，都不太得志，于是冰释前嫌，颇有点相见恨晚，王安石对苏东坡评价很高，感慨说：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苕溪渔隐从话前集》收了潘子真的《诗话》，其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了王安石希望苏东坡像自己一样，能在南京定居，在这买房子买地养老，成为他的邻居：

东坡得请宜兴，道过钟山，见荆公，时公病方愈，令坡诵近作，因为手写一通以为赠；复自诵诗，俾坡书以赠已，仍约坡卜居秦淮。故坡和公诗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事实上，即便到了南宋，南京市民的安逸生活，也没有太大改变。南京的名称，再次由江宁改为建康，建康府是陪京和留都，南京繁华与否，只要浏览一下当时的秦淮河风光，便可以知道大概。乾道五年，也就是1169年的冬日，建康府重修了镇淮和饮虹二桥，这两座桥横跨秦淮河，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自江淮吴蜀，游民行商，分屯之旅，假道之宾客，杂沓旁午，肩摩毂击，穷日夜不止。

与唐朝相比，宋朝远没有盛唐的强盛，具体到南京这座城市，无论北宋或是南宋，都要比隋唐时期安定得多，也繁华得多。当时的南京，所谓“罗绮一城，富六朝之风物，弦歌千里，绵万世之衣冠”。

南宋时期，南京人感到最大的不光彩，不是经济不够富裕，也不是人物不够优秀，而是这里出了一个秦桧。历史上，南京专门出亡国皇帝，这似乎还不够丢人，竟然又出了一个害怕打仗，只知道投降的宰相。秦桧是地道的南京人，少年时期在这里读书，科举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他曾经两次入相，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投降派，被列入《宋史·奸臣传》，臭名昭著。

北宋大观元年，也就是公元1107年，宋徽宗下令，由朝廷出面，设立了一个九域图志局，专门负责志书的编纂工作，督导各州县大修方志，开启了国家设局修方志的先例。这个传统后来一直被延续，到南宋的乾道年间，时任建康府知府的史正志出面，组织编撰了一部《乾道建康志》。这是南宋时期有关南京的第一部方志，今已亡佚，大家只能其他的方志中见到它的影子。

史正志是当时很有名的主战派，与同样是主战的辛弃疾志同道合，他的职务是建康府知府兼江东安抚使，同时还兼任沿江水军制置使和行宫留守。在职期间，他文武双修，不仅重视建康府的城防，修造战船，修缮城墙，还设置了贡院，最初只是用于县府学考试，占地不大，应考人数亦不多。如果遇到考生突然增多，便借用僧寺举行考试，正是这个不是太大的考试场所，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江南贡院。

组织编撰地方志，向来是盛世而为之事。梁启超先生曾说过：“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下期看点：在诸多记录南京的方志中，最权威，最有影响，应该还是《景定建康志》。乾道和景定分别是南宋的年号，而再后来的《至正金陵新志》的“至正”，已是元朝的年号。在中国古代，地方志是研究城市历史的重要文献，《景定建康志》名列廿四本南京传世名著，是研究南京历史无法避开的一本书，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上期提要：回首厦门经济特区25年走过的不平凡历程，近平同志对内涵丰富的厦门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厦门的人民群众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多年来厦门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厦门的同志创造了很多精神，最早是陈嘉庚精神，20世纪50年代有海堤精神，还有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等等。这些凝聚成了一种艰苦奋斗、拼搏创新的厦门精神。

曾几何时，改革开放这样一种东风，全方位的开放，厦门人树立了一种改革开放的厦门精神，这里边有自力更生，这里边有锐意创新，这里边有一种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内涵。厦门也从一个封闭的海防城市，建设成现代化的海上花园，为人所羡慕的一个美丽现代化城市。

采访组：1985年，习近平同志力促成立厦门经济信息中心，打造宏观经济的“千里眼”。请您谈谈整个建设过程。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建设非常重视。根据国家和省里对经济信息管理系统的规范和要求，厦门1984年就开始筹建这样一个信息中心，当时叫计算机站，1985年改为现在这个名称。

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的筹建工作抓得非常紧，一环扣一环地推进。他认为，特区要发展市场经济，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光有机场、码头、通信设施是不够的，还要打造宏观的“千里眼”，准确及时地掌握国内外经济信息。因此他非常重视市经济信息中心的建设，成立了厦门市经济信息管理领导小组，亲自担任组长，并把经济信息中心建设列为厦门市基础设施八大工程之一。

市里委托一家企业设计了总体方案，近平同志组织国内75名计算机和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来厦门进行论证。要干事就要有人，我们这个信息中心是从计算机站发展起来的，开始只有十几个人。要搞这么大的系统，十几个人干不了。于是市里就批了120人的编制。编制解决了，还要解决办公场所，于是又拨款买了7层楼，一共5040平方米。

在近平同志力促之下，市经济信息中心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国家计委信息办非常满意，把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列为全国试点单位。到现在，信息中心运行已经30多年了，对推进厦门的信息化、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给厦门解决了“千里眼”的问题。

我认为，近平同志当时的考虑是非常超前而又非常周到的。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城市能建飞机场就可以了，哪里还能想到要建什么信息中心。别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他却认为势在必行，还把它的列入全市八大工程之一。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曾主持起草了“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调研报告，您是重要的参与者。请您谈谈这件事情。

郑金沐：搞自由港这个设想，最初是省委书记项南同志提出来的。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但当时我们这些人对自由港是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只知道个大概，认识上很模糊。除了三大政策，即：人员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自由港还有哪些政策、哪些功能，大家都不清楚。这就好比送给你大餐，你都不知道怎么下口。

为了研究自由港政策和厦门今后发展问题，1986年8月，市委、市政府同意近平同志的建议，决定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由近平同志主抓，我担任办公室主任。他曾带着课题组部分人员到新加坡考察，回来就跟我们商量，“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方案到底怎么做、怎么写。他说：“我们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厦门的实际，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式，更不能搬用香港的模式，可以把它们作为重要参考。”他要求课题组的同志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研究解决厦门自由港发展模式，争取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自由港的路子。根据近平同志的意见，我们经过深入研



通过采访
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同事、接触过的干部群众，真实还原和再现了他在厦门的从政轨迹和领导风范。

究，认为厦门发展自由港应该采取“三步走”加“双梯度”开放的模式。

什么是“三步走”？就是通过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扩大自由度。最初特区划定面积为2.5平方公里，后来扩大到全岛。岛内开放度也不太一样，原来那2.5平方公里的开放度高一点，老市区开放度就很低。根据厦门特区现状，划区分三步逐步推进，逐步增加自由港的因素，提高开放的梯度和开放的层次。第一步就是建立保税区。厦门保税区应该是全国最早提出来的。第二步就是以自由贸易区替代保税区。第三步就是有限度地全岛放开的自由港。

“双梯度”，就是在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保持“双梯度”发展。如果像刷油漆一样，先刷第一遍，等它干了再刷第二遍，一遍遍地来，这样会很慢，所以要搞“双梯度”推进。第一个阶段是保税区和特区双梯度，保税区开放力度大一点。第二个阶段是开放程度比较大但管理比较严格的自贸区和经济特区的双梯度。最后是自贸区和有限度的全岛放开的自由港的双梯度。

人员进出方面，特别是外国人的进出，近平同志的意见是近期可以采取落地签证的办法，远期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后来我们也都这样做了。

商品进出方面，新加坡之前也是学香港一下子全部放开，那样它自己的工业一下子就会被打垮。但要是封死了，自由港就建不起来，于是它就先搞了保税区，一共建了8个。新加坡本国600多个产品，它把这些产品排序，哪些是可以竞争赢外国的，那么这一类的外国产品就让它进来，其他产品就放到保税区去，逐步开放。这种做法，既实施了某些自由港的政策，又保护了本国的工业。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资金、人员、商品三个方面的进出，都是用双梯度开放的办法。商品的双梯度开放其实是吸取了新加坡的教训。厦门还有很多老企业，一下子放开是承受不了的。在保税区，外国进口的产品可以实行比较高的开放，特区(非保税区)就逐步参照条件开放，到最后才实行整个厦门岛商品的自由进出。

关于资金自由进出，一开始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考虑是不是发行特区货币。中央曾派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劭文同志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同志到香港、深圳考察研究，也到了厦门。他们调研后，感到现在发行特区货币没有条件，也不能采用香港的模式，即“内外兼容”的模式，而只能借鉴新加坡“离岸金融”的模式。“离岸金融”这个概念在全国也是从厦门率先提出来的。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市委、市政府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你们的成果吧？

郑金沐：是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近平同志抓战略研究办公室的重要成果。而组织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是近平同志对厦门一个全局性的贡献。

我当时在市计委工作很多年了，一直都是搞“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从来没搞过什么发展战略，而且特区也很少有人关注发展战略。

下期看点：拜访了名师大家之后，习近平同志心里就有谱了，知道怎么做这件事。他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还有厦门大学有关院系教研人员，还抽调了市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总共100来人开始做这个研究，围绕对台问题、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21个专题的研究。